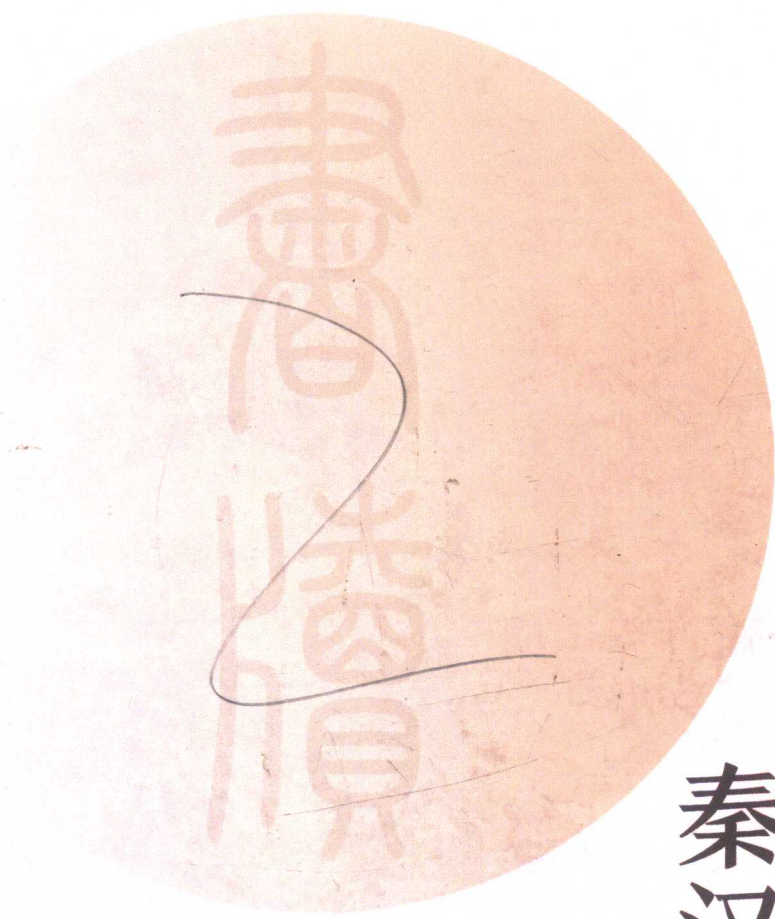




秦汉书牋研究

郭炳洁 著



科学出版社

本书得到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河洛文化』重点学科以及科研专项经费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2020-CXTD-04）的资助

秦汉书牘研究

郭炳洁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书牋是人际沟通的工具，负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20 世纪初以来，秦汉书牋的大量出土补充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增加了书牋材料数量。本书以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的书牋为研究对象，将其放置在秦汉历史背景下，通过对书牋文本内容和写作载体的分析探讨，考察书牋内容、形制、功能的特征及内在要素的变化，揭示其蕴含的人际交往、民众精神以及社会发展状况，以理解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建立初期秦汉社会的国家治理、民众生活世界和社会风貌。

本书可供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者，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汉书牋研究 / 郭炳洁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7
ISBN 978-7-03-061927-3

I. ①秦… II. ①郭… III. ①书信-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IV. ①K820.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8032 号

责任编辑: 王 媛 赵云杰 / 责任校对: 韩 杨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润一文化

编辑部电话: 010-64011837

E-mail: yangji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 //www. sciencep. 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 × 1000 B5

2019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字数: 197 000

定价: 8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论 学术史的梳理与秦汉书牋概念、名称	1
第一章 先秦时期书牋的源流	21
第二章 秦汉日常交往领域的书牋	28
一、日常书牋	29
二、社交礼仪书牋	42
三、教诫书牋	51
第三章 秦汉非日常交往领域的书牋	59
一、非日常交往领域书牋的种类	59
二、民众进入非日常交往领域的原因	71
三、非日常交往书牋性质辨析（以吏民诣阙之章为例）	74
第四章 秦汉书牋形制的特征	95
一、整齐划一的简牋长度	95
二、长短不一的书牋篇幅	98
第五章 秦汉书牋的功能	108
一、实用性功能	108

二、立言功能	110
三、干禄功能	112
四、礼仪功能	113
五、建构人际关系功能	115
第六章 书牒与秦汉民众精神世界	118
一、强烈的政治社会参与意识	118
二、世俗化的情感追求	123
三、变化的信仰世界	127
四、士人退守的人生价值取向	130
第七章 书牒与秦汉民众社会交往	133
一、遵循礼仪交往原则	133
二、钱物在人际交往中的纽带作用	137
三、民众身份地位的相对齐等	140
四、运用书牒交往的规范性	145
第八章 书牒与秦汉社会状况	147
一、社会整体文化水平提升	147
二、社会人口流动频繁	157
三、商品经济发展	166
参考文献	173
附录 从书信落款“顿首”看李陵《答苏武书》真伪	181

绪论 学术史的梳理与秦汉书牋

概念、名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文学领域中的研究状况

魏晋时期，随着各种文体创作经验的积累，文学自觉的时代到来，出现了专门对各类文体的特点以及产生、发展和流变进行研究的文体学著作与对文章进行分类编辑的文集，书牋文作为文体的一种受到重视。第一部按文体区分的著作是南朝梁代萧统的《文选》，其上书类、书类中有秦汉书牋作品的收录。萧统所选书牋是具有极强文学感染力的作品，如邹阳《狱中上书自明》、司马迁《报任安书》等名篇。同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第一部系统论述文体分类的著作，阐释了书牋的源流、文体特征，以及前代名篇的风采。刘勰在论述书记类文体渊源流变时指出，奏启类的公文是战国以后出现、从书记类中分支出来的部分，指出秦汉书牋品名的流变情况。^①

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的兴起、新思想的出现使传统书牋作品丧失了用武之地，一部分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特色的文人对书牋文化无限留恋，促使这一时期出现大量专门研究书牋的作品。周作人在《语丝》等杂志上曾先后发表了《日记与尺牋》《关于尺牋》《再论尺牋》等专论性的文章，表达了对文言尺牋的无限眷恋。周作人曾把书牋分为“书”和“信”两部分，认为“大

^①（南朝梁）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49～353页。

抵书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尺牋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①朱光潜将秦汉至明朝的书牋演变分为五个时期，论述了每个阶段书牋的文风；将书牋文风的演变划分为三派：一是古文派，二是骈俪派，三是帖札派。^②1940年2月到12月，《自修》杂志分四十六辑连载的郑逸梅的《尺牋丛话》是尺牋研究史料汇编，该书以笔记的形式介绍了诸如尺牋名称的起源、尺牋中的称谓、有哪些尺牋范本可供参考、民国流行哪些名人的信札，等等。作者纵横古今、娓娓道来，全面介绍了尺牋的相关知识。^③1946—1947年，书简杂志社在重庆主办的《书简杂志》“以研究书简应用文，提供发表各种书简为宗旨”，专门将书牋作为研究对象。虽然该杂志只存在了一年，但是其地位在书牋的研究史上却不容忽视。它首次转变视角，主要考察了书牋的应用功能，并发表了一些有关书牋的研究文章。刘后晨的《书简源流考》是一篇全面考察书牋各要素的文章，包括书简名称、起源及其发展、体例之变迁、字体、用纸及折叠式样、函封、忌讳、未来之趋势。由于内容涵盖面广、时间跨度大，论述有些简单，部分观点限于材料不够严谨。但是，书简研究的视野有所扩展。^④刘后晨的另一篇文章《书简研究》，从书牋应用途径入手分别论述民国时代慰唁类、请托类、劝诫类、索借类书牋的特点以及如何写作。其分类标准紧扣书牋的应用属性，眼光独到。^⑤锡九在论述书简与文学的区别时，指出：“书简在某一方面，向文学提供了许多素材，原料”“书简不是文学”“成为通行到文学之路的桥梁”。^⑥这一时期一般以书牋的整体状况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较大，共性的研究对理解秦汉的书牋状况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秦汉书牋主要是古代文体史和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关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领域对书牋文的研究概况，李新科在《汉代

① 周作人：《周作人书信》，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② 朱光潜：《文艺杂谈》，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1～174页。

③ 文章于2004年辑录成书出版。郑逸梅：《尺牋丛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④ 刘后晨：《书简源流考》，《书简杂志》1946年第2期，第2～3页；1946年第3期，第4～5页。

⑤ 刘后晨：《书简研究》，《书简杂志》1947年第9期，第7～8页；第10期，第7～8页；第11期，第8～9页。

⑥ 锡九：《书简与文学》，《书简杂志》1946年第6期，第2页。

书牍文研究综述》一文中详细的综述。作者总结汉代书牍研究的特点：“大部分对书牍文的源流，汉代书牍文的艺术特色等关注较多，对汉代书牍文的体制、文化内涵等方面关注不够，这是由于他们多未能把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相结合而造成的。”文中特别指出熊礼汇《先唐散文艺术论》对东汉书牍文研究对象的拓展具有的重要意义，以及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对书牍文研究的价值。^①需要补充的是：第一，20世纪80年代后的文学史对书牍文价值和应用功能越来越重视。如马积高、黄钧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1992年版中还没有秦汉书牍内容，2006年第二版时加入了秦汉书牍体散文的内容。第二，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一书中明确界定了书牍文的范围，指出：“古代臣下向皇帝陈言进词所写的公文与亲朋间往来的私人信件，均称为‘书’。因此，古代以‘书’名篇的文字，实包括两种文体。为了加以区别，一般把前者称为‘上书’或‘奏书’，属公牍文的‘奏疏’（亦称‘奏议’）类；后者则单称‘书’，或称为‘书牍’‘书札’‘书简’，属应用文的‘书牍’类。”^②作者对书牍文范围的界定遂成为文学领域研究书牍作品范围的不刊之论，但与古代其他文体论及《文选》对书牍文范围的界定有很大出入。赵树功在《中国尺牍文学史》中指出：“秦汉之际，尺牍逐步完成了向私人化的过渡，由于和源头相近，从而更易开风启源，一切都无套子、无束缚，后世不少内容的尺牍，多能在汉代寻到根。”^③他认为：中国古代书信的基本作用，表现为信息传递与信息交流；其审美特性在信息交流中生成、发展，用与美的结合是书信的重要特征。^④柏秀叶的《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论》一文，专门考察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的演变轨迹、题材内容、艺术特色及文学史影响等方面。^⑤

对单篇书牍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名篇佳作上，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不仅是了解司马迁思想的重要文献，更是散文名篇，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从思想情感、词汇语法、文献价值等方面对其进行研究；李

① 李新科：《汉代书牍文研究综述》，《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105～106页。

②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87页。

③ 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5页。

④ 赵树功：《尺牍之用》，《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50～53页。

⑤ 柏秀叶：《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论》，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陵的《答苏武书》，此书牋的真伪问题是学术热点。《史记》《汉书》都未收录李陵书牋，它最早出现在梁代萧统的《文选》中。自南朝宋学者颜延之对其真实性进行质疑后，围绕其真伪问题的聚讼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统一的结论。另外还有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秦嘉夫妇互通的书牋也受到学者的关注。

近年来，随着古代文学研究学术观念的变化，即“古代文学由单纯的价值判断而转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的设施而向客观历史的回归”^①，文学研究开始注重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和整理，立足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形态成为一些学者的自觉追求。具体到秦汉书牋研究，有朱进国的《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赏析》一书，选取秦汉时期的书牋七篇，紧扣作者的情感世界对其进行文学性、艺术性品鉴的同时，还进行详细注疏、考证和研究，揭示文人心态和知识者情怀。^②何志军的《汉代应用文文体形态略论》，把握中国古代文体往往兼具实用与审美的特点，将书牋文作为日常应用文的文体之一，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同时，将汉代的应用文体放置在秦汉儒学兴盛与礼制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揭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体现了作者力图从历史事实和历史文献本身出发对秦汉应用文体研究的思路。^③

（二）历史学领域中的研究状况

与文学关注史料的情感因素、美学价值等不同，历史学者注重史料本身及其传递的时代信息。传世文献中书牋数量有限且主要是以情感交流为主，除个别书牋受到关注外，其他很难进入史学家的视野。

近年来，随着思想史研究对象逐渐从经典思想家身上扩散开去，更多的史料纳入研究范畴，书牋的史料价值受到关注。葛兆光在谈到中国思想史的写法时指出：“当思想史真的改变了自己的叙述角度和观察框架，把过去并不那么精英和经典的文本也当做构筑思想史语境的资源，那么，那些平时不被重视的信札、书画、年历、日记、公文、广告以及其他的种种资料，就会进

① 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总序》，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页。

② 朱进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赏析》，银川：阳光出版社，2013年。

③ 何志军：《汉代应用文文体形态略论》，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入思想史的视野。”^①孙家洲指出,司马迁《报任安书》、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李陵《答苏武书》、杨恽《报孙会宗书》、李固《遗黄琼书》中蕴含了性情之美,“书札散文,风姿各异,皆以真性情而感人”^②。每一封信牍,都能体现致书人的真实思想、情感,都有它的价值所在。

有学者从历史长时间段探讨书牍类别及构成的演变,以期揭示书牍礼仪系统化的发展轨迹。梁满仓指出:先秦时期,无论是臣答君的回信,还是臣子之间的通信,都一律称书。秦汉时,皇帝给臣下的书称为“诏书”“赐书”,臣下给皇帝的书称为“上书”“上奏”,加“上”字强调以卑达尊之意。另外,还有“表”“章”“笺”。各种类别的书信可分为公文和私信两大类。^③吴丽娱在《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三章“表状笺启书仪探源”中论述书仪的渊源时,论及秦汉的尺牍之学。作者把秦汉尺牍之学放在魏晋隋唐官场书仪发展的源流中考察,指出秦汉尺牍与唐代表状笺启书仪之间的源流关系,更多地关注了秦汉尺牍的官文书特征,并从这一角度论述尺牍的书法、制度、文笔修辞。^④

20世纪以来出土的秦汉简牍中包含了大量保持原始风貌的书牍,给秦汉书牍研究带来契机。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一辈学者就注意到这些材料。陈槃在《汉晋遗简偶述》中对简牍实物书牍文书条疏举例,如“书疏称记”“书启称死罪”“书启称不备不具”“汉晋人书启不定作八行”等,论述汉代书牍的名称、语言、书写习惯等。^⑤陈直《两汉书札的形式》一文结合出土汉简,对汉代书牍称谓的变化、书牍名称与变化以及书牍的上下款式进行研究。^⑥

近年来,简牍学等对简牍形制以及官文书制度的探讨为我们理解秦汉书牍形制、封检、传递方式等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背景知识,它们有大致相同的书写材料、时代文化背景。李均明、刘军所的《简牍文书学》一书,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简牍文书的一般规律,是进行简牍乃至相应时代历史研究的基础。

①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1页。

② 孙家洲:《插图本中国古代思想史·秦汉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0页。

③ 梁满仓:《论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的类别及其构成的变化》,《江海学刊》2014年第5期,第148~153页。

④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8~82页。

⑤ 陈槃撰:《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⑥ 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49~153页。

础。书中对简牍文书的质材、文字符号、版面、分类等进行了详尽的考述；对不同文书进行了分类研究，其中书檄类中私记为私人信件，内容不乏公务内容，多用敬语、谦语。^①汪桂海的《汉代官文书制度》一书，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对秦汉官文书的类别、结构程式、特定的文书用语、避讳和抬头、运行和管理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研究。^②

对出土书牋进行整理、校释的有：杨芬的博士学位论文《出土秦汉书信汇校集注》，对已公布的睡虎地秦书信、天长西汉书信、敦煌汉代书信、居延汉代书信、东牌楼东汉书信以及张家界古人堤东汉书信进行全面的汇校集注，并对秦汉书信的形制、版面、结构与惯用语等进行专题论述。^③马怡对《侈与督邮书》的文字重作释读并加以考证，对其所涉及的汉代书信格式和形制等进行了探讨。

结合简牍学、历史学对书牋进行阐释的有：陈兰兰在对秦汉简牍私文书的研究中将私人信件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梳理出汉代简牍中私人信件的种类、发展特征以及其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④张蕊的《出土汉代简帛私人书信研究》，对汉代私人书信的格式、常用语、自称，以及书信中关涉的“书”“记”、《侈与督邮书》的释字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⑤孙春叶的《西北书信汉简研究》，在对西北简牍书信内容分类的基础上，对书信内容、书信称谓进行论述，并对书信中所见的饲养牲口的草料——“茭”、运输业“僦”和从事运输业的“僦人”问题进行全面分析解读。^⑥彭砺志的《尺牍书法——从形制到艺术》是一篇将尺牍文献与尺牍书法结合研究的佳作，作者将尺牍书写载体、样式与书法艺术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其实用性形制入手，通过对形制与艺术之间互动关系的历时性考察，揭示尺牍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及其对中国书法发展走向的影响。作者对秦汉尺牍结构用语、书写形制、平阙制度等进行深

① 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68～271页。

②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③ 杨芬：《出土秦汉书信汇校集注》，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④ 陈兰兰：《汉代简牍中的私人书信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⑤ 张蕊：《出土汉代简帛私人书信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⑥ 孙春叶：《西北书信汉简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入分析，揭示了尺牋具有的文本及书法双重内涵。作者将一切用于往来通信的书面文字（包括公私尺牋）皆作为“尺牋”的定义，拓宽了尺牋的研究范围，为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书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①

二、本书学术意义、研究思路及框架

（一）学术意义

首先，书牋是以文字为媒介进行人际交流的工具。它以特定的形式、语言实现民众之间的信息传递、情感交流和礼仪交往。书牋是了解过往历史的钥匙，通过它，我们可以更为真切地感受到社会交往中人的行为特征、思想面貌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与书牋有关的称谓是一个随着历史发展，名称与文化内涵不断发生变化的词汇，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如尺牋、尺素、尺翰、书牋、书札、书简、书启等。长期以来，秦汉书牋一直在文学研究者的视域范围内。以现代文学观念去探究秦汉书牋时，只有那些具有文采，能够传递美感的作品才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惲《报孙会宗书》、秦嘉夫妇互通的情书等。很多实用性质的书牋因不具备审美属性而被摒弃在研究之外，其中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湮没无闻。其次，书牋是文书的一种，“文书，是指社会组织或个人在各自活动中用来记录和传递信息的书面文字形式”^②。书牋不仅是宣情达意的工具，更是交往主体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社会交往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它是以“生活世界”作为背景，“生活世界”中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因素是书牋内容的活水源头，也只有将书牋放置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才能全面揭示其内涵和价值。

书牋自产生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变化，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笼统地、不加辨析地运用后世的概念描述秦汉书牋的状况，有悖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基本原则。本书从历史学、文献学以及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书牋作为历史事物考察，放置在秦汉的时代背景中，

① 彭砺志：《尺牋书法——从形制到艺术》，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② 姬瑞环、张虹编著：《公文写作与处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确立秦汉书牋研究框架结构，考察其本身及其相关的社会现象。本书将秦汉书牋放置在秦汉四百多年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考察其概念、内涵范围、文献分类、形制特点、内容功能，以及其中反映的秦汉民众的精神世界、社会交往和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等内容。

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秦汉社会状况和揭示社会结构变化。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热点。马新、齐涛指出：“所谓社会史，就是研究特定时期或整个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模式，研究上述关系的演进及其所存续的外在环境的交换状态，进而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①书牋是人们运用书面语言进行人际交流的方式，是实际交往状态的模拟、演示与延伸，是社会史研究的素材。检索近年来秦汉史领域社会史著作与论文，研究者在秦汉时期人们婚丧嫁娶、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家庭宗族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而关注人们动态的社会交往活动是薄弱环节，本书在这方面可起到补充作用。

本书的研究视角可发掘书牋本身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汉书》中收录了大量有系于政事的应用文，书牋就是其中之一。赵翼指出：“今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②葛兆光指出，如果思想史改变了自己的叙述角度和观察框架，信札、书画、年历、日记等资料，就会进入研究视野。^③20世纪出土的秦汉简牋中包含大量的书牋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文学审美的眼光，那么已经有足够的史料可以使我们将秦汉书牋作为研究对象，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变过去习惯的叙述方式，去吸纳和解释这些资料。转换审视的视角，从历史学、社会学、文献学的角度对秦汉书牋进行研究，书牋的史料价值能更好地被利用。

本书有助于推动秦汉官文书研究进一步深化。随着20世纪初以来秦汉简牋大量出土，利用简牋资料研究秦汉官文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众所周知，汉承秦制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巩固政权，汉政权抛弃了秦朝国家与社会彻底分离、国家统治社会的统治模式，提倡家国同构，吸收社

① 马新、齐涛：《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57页。

②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页。

③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41页。

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这样，政府的文书系统中，在以政府为主体运行的公务文书之外，还有少量以社会力量为主体，主要以自下而上方式与地方行政长官、中央公卿乃至皇帝沟通的文书。笔者认为，后者与前者不是同一性质的文书，它不是公文，而是人际交流的书牋，与亲友之间的书牋往来性质一致。仔细分析秦汉文献会发现，在具体的文书运作中，由吏民写成、需要诣阙呈递的章在写作程式、传送途径、回复方式等方面与奏、表、议截然不同。只有理解了两者的不同，在具体的研究中才不至于将之混淆。

本书可以解读秦汉民众精神世界以及交往活动。作为人们以书面形式交往的工具，书牋是人们心声最接近真实的流露，其不仅能反映人们的性情世界，而且能反映人们的交际方式、社会的礼俗风情。通过书牋，我们可以了解丰富多彩的秦汉民众的精神世界，了解民众人际交往的状态，以理解经历春秋战国社会变革后，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建立对民众的治理状况。

（二）研究思路

本书在充分吸收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搜集更为广泛的文献与考古资料，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历史学、社会学、文献学的角度对秦汉书牋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整理、分析；解读秦汉书牋的文献学分类、书牋的形制诸要素特征、书牋的内容特征和功能，以及书牋中反映的秦汉民众精神世界、社会交往与社会状况。本书在对秦汉书牋进行研究时，一方面将其放置在当时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把握书牋与秦汉社会互动的关系；另一方面，重视秦汉书牋自身的发展和演变。

（三）本书框架

本书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对秦汉书牋进行学术史梳理，分析选题的意义，确定研究思路和框架，解释书牋概念，对书牋分类进行说明，并考证秦汉时期书牋的称谓。

第一章考证先秦书牋源流。对先秦时期书牋的起源发展进行探析，揭示随着私人领域的发展，书牋逐渐从公文中分离出来并自成一体的发展轨迹。

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秦汉书牍的整体研究。第一，运用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将书牍分别放置在日常交往领域与非日常交往领域中分类。日常交往书牍主要应用在以血缘和天然情感为纽带的亲人和朋友之间，包括日常性的情感信息交流、请托、赠物等书牍；应用于社交礼仪中的庆贺、吊丧、送行、问疾、介绍和报等书牍；专门以劝勉、教诫他人为旨趣的教诫书牍。非日常交往书牍是民众就政治生活中的事宜与各级行政长官乃至皇帝交流的书牍，包括关系国家事务的书牍和关系个人事务的书牍。由于传统观念认为非日常交往书牍为公文，在对其分类之前，本书以吏民的诣阙上书为例进行了辨析：首先指出汉代“家国同构”的治国理念以及汉代国家鼓励民众进言进谏的制度，为民众进入非日常交往领域提供了条件；其次从现代公文概念、文体学著作、文体类别、交付渠道、回复方式等方面考察吏民诣阙上书与公文性质不同，应属于书牍。第二，对书牍形制进行分析。形制指书牍在交际过程中形成的某种约定俗成的制作和书写样式，首先表现为出土的长短不一的简牍中，吏民书牍均使用长度为一尺的牍为载体，这也是后世称书信为“尺牍”的由来。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皇帝使用的是尺一牍。其次一般情况下，日常交往领域的书牍篇幅简短，而非日常交往领域的书牍篇幅不限。最后秦汉书牍具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及格式用语，由称谓、提称、具礼、祝愿词以及下款中的具礼组成，其中由尊称与具礼共同构成的示敬方式，秦汉间经历了形式由相对单一到逐步多样化的变化。第三，阐述书牍承担的功能。作为应用文体，实用性功能是第一位的，秦汉书牍在实现最基本的传递信息、交流情感、处理问题这些实用性功能的同时，还承担有益于世道人心、个体扬名的立言功能，实现阶层提升的干禄功能，礼尚往来的礼仪功能，以及在地缘、职缘范围内建构人际关系等功能。

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考察书牍反映的秦汉民众精神世界、人际交往以及社会发展状况。在对书牍分类、形制特征及功能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释：第一，民众的精神世界方面：①体现出秦汉民众强烈的政治社会参与意识，这从众多的吏民诣阙上书奏记和教诫书牍中可以体现出来。民众通过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这是秦汉时期各项制度以及思想文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什伍连坐制度将民众建构成利益共同体，相互之间必须负有责任义务。选官制度中的征辟“直言

极谏”，允许“自衒鬻”等为民众参与政治提供条件。忧患意识是秦汉民众政治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心理基础，忧患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心中。秦汉一系列制度保障了民众参与政治的实现。②“善毋恙”“加餐饭”等祝愿词，以及对身体无忧、努力享受美食美酒的向往，反映出秦汉民众追求现世安稳的世俗化追求。这与秦汉经济发展、民众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③“毋恙”“善毋恙”属于辟邪祈福的吉语，反映出民众的巫术信仰。东汉中期以后这一类词语逐渐消失，是民众巫术信仰逐渐萎缩的表现。这是东汉中后期，道教、佛教等宗教发展，日益挤压巫术生存空间的结果。④东汉后期部分士人产生退守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东汉后期政治黑暗、士人仕途受阻的结果。第二，民众的社会交往方面：①书牍形制和内容体现出秦汉民众在社会交往中遵循一定礼仪原则的特征。秦汉书牍格式体现出“礼敬”原则，书牍称谓遵循“卑己尊人”的原则，书牍交往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这是秦汉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②涉及钱物的内容在书牍中经常出现，反映出钱物在秦汉民众社会交往中的重要纽带作用。钱物是礼仪交往活动的重要载体，民众通过钱物进行互助性交往、情谊表达，是战国以来民众冲破血缘关系的束缚，在广阔的地缘关系、职缘关系范围内建构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③书牍载体尺牍的使用以及称谓、具礼、尊称等在各个阶层、地域的统一性特征反映出秦汉民众社会身份地位的相对齐等。齐民是秦汉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对人们身份重组的结果。东汉后期，拜礼与尊称出现等差性，受书人的社会地位或者致书人与受书人的关系决定了拜礼的等次、尊称的轻重，反映出人们身份由等齐向尊卑差次逐渐演变的社会现象。④民众在使用书牍交往方式上的规范性。汉代民众日常交往书牍信息量小，话题内容局限在日常生活领域内，而非日常交往的书牍往往信息量大，话题内容涉及致书人在政治中的遭遇、国家政治等，反映出政治力量对民众社会交往的影响和控制。第三，社会发展状况方面：①书牍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下层民众中的广泛使用，反映出秦汉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②书牍的使用反映出秦汉官吏、民众、学子等各个社会阶层社会流动的频繁。③书牍的内容反映出秦汉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民众生活与商品经济息息相关的社会现实。

附录内容是运用本书研究成果，对千年来聚讼纷纭的李陵《答苏武书》

真伪问题进行探讨,为问题的解决提供独特视角。根据对西汉书牋书写习惯、格式语言的分析,本书认为李陵《答苏武书》的写作篇幅、下款具礼中的“顿首”不符合西汉书牋的特征,得出该书牋为伪作的倾向性结论。

三、书牋的概念、类别的界定及秦汉书牋的名称

(一) 书牋的概念及类别的界定

秦汉是各种文体发展分化的时期,清晰的文体边界还没有完全形成,公私文书还有一些模糊性,由凡是书写于竹帛上的文书统称为“书”可见一斑。《说文解字》云:“书,著者也。”段玉裁注曰:“书者,如也,著于竹帛,非笔末由矣。”^①《释名》:“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之简纸,永不灭也。”^②本书对书牋概念的界定舍弃了传统的依据文章风格、体裁和式样的文体学定义的观点,认为书牋是致书人以个人身份,代表个人意志与他人进行信息传递、情感交流的文书,具有私人化、隐秘性的特点,内容包括公私事务。

书牋是人际交往的工具。人的存在离不开社会,社会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人只有在与他人的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社会的人。交往是社会中人存在的普遍状态,“所谓交往是指人的世界中共在的主体间通过语言符号系统或操作活动系统而建构起的‘主体—主体’结构,是指诸主体的主体间性的展开。换言之,所谓交往就是共在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③。交往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其活动以生活世界为背景,“达至相互理解的交往行动并不是在真空内进行的,在其背后,必然存在着与交往行动形成互补的背景,这一交往背景内涵是生活世界的内容规定性之一”^④。

20世纪末以来,对生活世界阐释是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中多元命题的重要

① (清)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卷6,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8页。

② 任继昉纂:《释名汇校》,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332页。

③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2~133页。

④ 刘悦笛:《论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意蕴》,《河北学刊》2002年第3期,第51页。